

考古解释何以可能？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 100872

摘要 考古解释是揭示考古材料所代表过去人类社会信息的过程，而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讲话，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起理论与材料之间合理的联系。考古解释的出发点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从考古材料的形成以及考古解释的过程来看，考古解释的真正出发点是理论。没有理论支撑，就没有考古解释，理论建设是发展考古解释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们可以利用的理论来源除了相关自然科学理论之外，还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专门服务于考古解释的中程理论。

关键词 考古解释；考古学理论；科学推理；考古材料；理论建设

考古学是一门主要以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然而，实物遗存本身不会说话，考古学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去揭示实物遗存所包含的古代信息，这个过程就是考古解释。按照常识，实物遗存也就是考古材料应该就是考古解释的出发点。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考古解释是一个过程，它包括若干种方式、若干不同的阶段、若干组成部分等。因此，当我们思考考古解释的基础时，就需要超越常识性的认识，从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深入思考。

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已经具有较为丰富的材料基础、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和一支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困难。当此之时，思考考古解释问题也就成为一种必要，这里拟从理论上分析考古解释产生的一般过程及其关键因素出发，探索发展考古解释的途径。这对于突破当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瓶颈、理解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发展研究思路可能有所助益。

1 问题的提出

一般意义上说，考古材料作为考古解释的对象，应该在考古学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考古材料的话，就不可能进行考古解释，从这

收稿日期：2023-09-21；接受日期：2024-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234）

作者简介：陈胜前，教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E-mail: csq@ruc.edu.cn

个意义上说,考古材料决定了考古解释的可能性。

回顾考古学史,我们也不难发现考古材料对于考古解释的推动与限制作用。设若没有直立人化石及其石器的发现,我们就无从了解早期人类的身体与文化形态,也无从了解人类的演化过程。没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我们就不会知道世界各地存在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没有仰韶、龙山等遗址的发现,中国文明的曙光还将只是古史传说。也正因为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从以中原为中心的模式演变为群星璀璨并向中心汇集的模式。考古材料的发现在不断推动我们的认识。当前有关夏王朝争论的核心问题还是缺乏某些关键的考古材料,如文字,如果找到这些材料,那些有关的怀疑都会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以考古材料为中心已经成为学科内外对中国考古学的刻板印象,中国考古学似乎除了材料还是材料。这种认识暗含着对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批评,究其原因,就是考古解释不足。发现不等于解释!发现古代遗存的方式是多样的,工程建设动土过程发现地下古代遗存是最常见的方式,其他方式还有盗掘、业余考古爱好者偶然发现,以及主动的考古调查。通过专业手段获取考古材料的基本要旨是保护好材料的时空关联,即剖面与平面上的空间关系。时空关联的尺度是高度变化的,不同尺度上可以有不同类型的信息。在特别微观的层面上,甚至可以考察一起微小的事件;而在特别宏观的层面上,则可以考察长周期的历史趋势。考古材料的属性远不只有时空关联,还有行为、文化、历史等层面的关联。正是因为考古材料属性具有多样性,考古学研究者必须对此有所选择: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方面而非那个方面呢?也就是说,考古解释首先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是在“我们想知道什么”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之间的平衡,由此也必然带来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考古材料真的是考古解释的出发点吗?

2 考古解释的出发点

“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由时代精神所决定的,与社会背景、时代思潮等密切相关,而与考古材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联。这里侧重讨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考古学研究至少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那么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科学研究按照所运用的基本逻辑可以划分为归纳与演绎。归纳逻辑的研究是从收集客观世界的相关事实出发,然后分析事实,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规律,进而构建出理论。演绎逻辑则从理论构建出发,从中推导可以通过事实来检验的假说,然后去寻找事实,进而完成假说的验证。我们通常称前者为自下而上的研究,称后者为自上而下的研究。两种研究途径相互补充,不同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有所侧重。文化历史考古学强调前者,而过程考古学强调后者。仅从研究逻辑的角度说,演绎的研究并不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如果我们只承认考古材料才是考古解释的出发点,那么演绎的研究势必要被排除在外,而这显然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

更进一步说,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所有研究都立足于一定的理论前提之上。这些理论前提是前人的认识,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离开基本的理论前提,研究就无法开展。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包含在科学的前提之中,即世界是客观存在,是有规律的,且是可知的,人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如果这个前提受到质疑,那么在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就会遇到困难。后过程考古学质疑的正是这一前提,它不认同存在客观的世界,强调所有研究都处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关联中,必定融入了时代的社会背景、思潮与认知模式。因此可以说,所有的考古材料必定要带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因为所有的考古材料必定是在一定的理论背景关联中获得的。就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家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1]。不过大多数时候,考古学家似乎将之视为一个常量(任何解释都是时代的产物),无须单独加以考虑。然而,考古学的重大进步必然是在哲学基础上层面的革新,就像后过程考古学之于过程考古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价值论上全面展开挑战^[2]。由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受到质疑,考古学研究发生了范式的变迁,后过程考古学取代过程考古学成为新的理论引领者。如果考虑到研究存在的基本理论前提以及“我们想知道什么”的问题,那么就不得不承认,理论才是考古解释的出发点。

3 考古解释的基础

绝大多数考古研究者并不愿意把具体的考古研究与形而上学的哲学讨论纠缠在一起。宾福德在其代表作中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考古学的研究过程,医生面对诸如发烧、呕吐等病征,无论对病征的描述多么细致,它都不能解释病因,除非了解人的生理与病理^[3]。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一方面需要关注病征,另一方面需要有充分的理论训练,否则,这些病征就没有意义。考古材料类似病征,考古解释需要理论的支持,考古学研究也是在理论与材料之间展开的,在两者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考古解释的基础,下面就此来分析它们与考古解释的关联。

3.1 理论与材料的关系

跟几乎所有学科一样,考古学的历史反映的是人类世界观发展的历史。每一点进步就在于提出了一些从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消除了一些从前的困惑,融入了一些从前未曾被注意到的事实。考古材料其实一直就在那里,在地上或地下,形式极为多样,从宏伟的建筑到蛛丝马迹般的微痕与微量元素。我们去寻找什么取决于我们的观念与理论,以及我们能够利用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回答什么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我们的观念与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是历史的、社会的。

当代中国考古学似乎相信考古学研究者是没有任何预设立场的,我们的认识是一张白纸,然后用“事实”来书写史前史。也许我可以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幻象”——

种对考古材料客观性的幻象。产生幻象的主要根源在于我们的观念与理论,把事实与认识混为一体,以至于失去了必要的反思能力,因为事实上考古学家并不可能得到客观的考古材料,这样的材料只是理想的模型。考古材料是考古学家在一定的认知模式(如科学)中获取的,经过认知过程的处理,物质遗存晋升为考古材料,没有经过处理的物质遗存就不能算是考古材料。盗墓者也在获取物质遗存,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破坏了基本的时空信息,也就失去了考古材料的价值。

即便物质遗存成为了考古材料,但考古材料并不会说话,也无法告诉我们它们所代表的人类行为信息,使其说话与揭示背后信息的是考古研究者。研究者的基本理论基础可以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从不同立场审视考古材料,考古材料的属性迥然不同。基于前者,考古材料是古人活动的遗留,就像动物化石一样^[4]。基于后者,则认为物质遗存本身就为文化意义所渗透,物质为人利用,反过来也能影响人本身。简言之,物即是人,人也是物,人与物是一体的。按照唯心主义的考古材料观,考古材料更像是文本^[5],是可以反复阐释的对象。

考古解释立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唯物主义的,考古材料与古人活动的关系是曾经发生过的,无论我们能否认识到,其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其研究途径也可以借鉴古生物学的模型,即利用行为模式与文化系统,把局部的、零碎的信息复原成为整体。以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为例,他们没有农业,不能生产食物,只能去自然界中采集、狩猎。而自然界中的食物资源是散布的,其中动物资源还是流动的,由此决定狩猎采集者必定需要流动,由此形成不同季节、不同功能的遗址,这就是狩猎采集者的行为模式,与农业生产者有明显的区别。遗址结构、器物形制与功能、器物组合与属性、动植物遗存构成乃至人类体质的生物属性都会存在显著差异^[6]。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的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变量密切相关,都需要适应流动的生活方式,由此考古学家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局部进而了解整体。行为模式与文化系统理论的构建需要考古学家自身基于民族志、考古材料以及其他学科的成果来完成,而很少能够直接照搬其他学科的理论。

考古学研究中存在一个悖论:我们不可能认识到那些不知道其意义的材料,然而考古研究者获取材料的目的就是希望探索其意义。比如说,碳十四技术诞生之前,没有考古研究者会有意去收集炭屑;在关注史前社会关系演化之前,考古研究者不大会特别关注墓葬的等级差异。这个悖论类似鸡与蛋哪个在先的争论,实际上,矛盾只是表面上的,这里涉及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考古学是根据有限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学科,它是局部的、特殊的、具体的推理。为了实现可靠的推理,考古学通常需要借助整体的、普遍的、抽象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按照柴尔德的说法,考古学是要去拼合过去^[7],把有关过去的零碎片段的信息拼合起来,构成可以理解的完整信息。如果考古研究者不知道人类过去生活的轮廓与结构,拼合如何能够进行下去呢?

不理解人类社会,就无法去研究古代社会。人类社会是一般意义上的,而古代社会

是特殊意义上的。先有一般而后有特殊，这也是过程考古学强调演绎推理与理论建设的重要原因。普遍理论不仅提供拼合考古信息的轮廓与架构，它还提供哲学基础，以及提升考古学研究意义的层次。考古学研究的意义不可能仅仅是发现了考古材料，它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个方面的意义。考古学意义探索的背后是各种理论的支撑，没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等学科理论襄助，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就只能停留在考古材料的层面上，而很难上升到人类行为、社会、文化与历史层面上，其成果也就很难为其他学科所参考。

以文明探源为例，如果国家是文明浓缩的表达^[8]，那么国家之前的社会组织形式究竟是什么？酋邦社会是不是国家社会的前身？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出现的？如此等等的问题其实不只有考古学关注，这些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都有理论探讨，从这些理论探讨出发，推导出物化的表现形式——考古学可以研究的对象。没有理论的推导，考古材料并不能自证它就是文明的物化表征。如果失去了理论指导，考古学就只能是一门纯粹的材料研究学科，或者说是提供研究材料的学科，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就大打折扣。

3.2 如何建立理论与材料的关联？

考古材料是过去人类社会的遗留，并不能直接从中得到人类社会信息，相关信息都是通过考古推理所得。理论是帮助我们进行推理的基础，也是考古解释的出发点，但這些理论基本都来自直接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因此在理论与考古材料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考古学研究就是要跨越这道鸿沟，所采取的途径从逻辑上来说包括演绎、归纳，此外，还有一条平行的路径，就是类比^[9]，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3.2.1 从理论到考古材料的演绎

演绎就是从理论出发推导出可以在考古材料中验证的假说。这里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另一个是文明起源的研究。所谓农业起源，究其本质就是古代人类放弃了狩猎采集自然资源的生计方式，通过驯化某些动植物来生产食物及其他必要的生活资料。由此涉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狩猎采集者要放弃原来久已适应的生计方式。有研究者从人口的角度加以回答，如博瑟拉普（Boserup）提出人口增加会推动技术革新^[10]；还有研究者认为还应该考虑到环境变迁，自然生境不足以为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11]；抑或是认为人口增加，群体规模扩大，导致社会竞争加剧，产生了增加生产剩余的需求^[12]。人口增加能否从考古材料上看起来呢？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的确较之早中期显著增加，但是由于埋藏与发现的原因，我们实际上很难确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增长的幅度。在中国，不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保存较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仍然是屈指可数。因此，人口增长就不是一个与考古材料结合得很好的变量，虽然理论上它可以言之成理。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起源并不是普遍现象，仅仅发生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除了

环境条件的约束（如可以驯化物种的有无），还需要考虑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自身的原因，即不是所有的狩猎采集者都可能走向农业起源。从文化生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者是以流动采食为生的群体，流动性是其文化系统的核心变量。比较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群体的生计活动组织，两者在流动性上的差异一目了然。要想走向农业适应，狩猎采集群体必须降低其流动性，直至定居的建立。流动性的高低会表现在石器技术、原料来源上，还会表现在遗址结构上^[3]。流动性的变化在考古材料上是可以检验的，通过考古材料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华北地区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发生重大的分化：太行山东麓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明显降低，出现了北方地区最早的农业源头，而在黄土高原上狩猎采集者继续保持高的流动性^[6]。从这个例子来看，流动性是一个比人口增长更适于通过考古材料来衡量的变量。对于演绎途径的研究而言，跨越理论与材料之间鸿沟的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能够贯通两者的变量，否则理论与材料仍然是“两张皮”。

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首先需要确定文明的概念以及文明形成的原因，这无疑需要相应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推导文明的物化特征。人类学导向的研究者偏好用酋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酋邦理论是否适合用以解释中国文明起源呢？酋邦理论是从民族志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用于解释中国文明起源时，存在古今不一致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差异两个问题。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他者”的学科，西方在研究自身文化的历史时很少会直接采用人类学的概念。酋邦理论本身也暗含着单线进化的思想，即酋邦是走向国家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前国家社会不论是在社会组织形态、规模上，还是在复杂程度、经济基础上，均差异巨大，已经超越酋邦概念本身所能包含的内容。酋邦理论强调资源再分配在社会公共权力生成中的主要作用^[13]，而从考古材料上来看，并没有大规模资源再分配的证据，再分配的更可能是一些威望物品^[14]。就理论的适用性而言，酋邦理论还存在不小的问题。类似之，其他的文明起源理论，如水利说^[15]、战争说^[16]、农业生产^[17]、人口^[18]，都有类似的问题，即不具有充分的普适性。

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是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关联的，其中涉及文化特殊性问题。在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可能会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从器物到景观，都会融入特定的文化意义，就像中国的风水观念，它们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而我们所说的文明，不仅仅指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复杂性进程，通常是指国家的起源，同时指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体系（或文化模式、文化形态）的起源。由此，在发展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时，既需要一般性的能够解释文明化进程（或称社会复杂化）的理论，也需要解释特定文化体系的形成。中国文明以连续、悠久而闻名，五千年的文明形成了稳定的传统，实际上，中国文明传统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万年前的农业起源阶段。就普遍性的理论而言，我们或可以借鉴世界范围的理论，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而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明而言，其理论发展只能依赖我们自己。

显然，适合研究文明（国家）起源的理论并不只有一个，选择合适的理论至关重要，而评价是否合适的标准就在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考古学研究的意义。也就是

说,在选择所研究变量的时候,需要考虑与考古材料结合的程度,真正发挥考古学作为一种实物遗存研究的长处。简言之,选择合适的理论,选择适合在考古材料上进行分析的变量,这是从理论到考古材料的演绎过程中首先要注意的两个关键点。

3.2.2 从考古材料出发的归纳研究

上一个层面的研究是自上而下的,而这个层面的研究是自下而上的。这两者的关系好比一只手的两面,从考古学史上来看,它们是相互推动的。自抽象而具体与自具体而抽象是相向而行的方式,非常有利于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效率。

当我们说从考古材料出发的时候,就意味着物质遗存已经经过调查或发掘成为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不再是自然存在状态,同时也意味着调查与发掘的手段是科学的,保留了物质遗存的时空关系,为下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可靠性的基础。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立足于考古地层学的基础上,它是文化过程与自然过程的产物,前者包括废弃、再利用等过程,后者包括埋藏、扰动等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考古材料是所有这些过程叠加的总和,而不仅仅指古人活动。假定考古材料就等于古人活动而忽视其形成过程的差异,不仅可能降低考古材料的可靠性,而且会忽视材料形成过程的意义,如叠加在过程中的环境变化信息。

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研究者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分类最简单的原则就是相似性,于是就可以看到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较多共性的考古材料组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组合体。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及考古材料的数量会影响到组合体的范围,比如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材料较少,而且基本只有石器材料,基于技术类型学的划分,一个组合体的范围可能跨越大洲。阿舍利技术不仅见于非洲,还见于欧亚大陆,持续的时间长度超过百万年。再比如在贵州地区,由于地形复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形制变化多样,几乎每个小盆地(坝子)的面貌都不相同。上述两种情况较为极端,大多数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组合体的时空范围较为明确,由此有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考古学文化是考古材料特征的呈现,这里借用了人类学的“文化”的概念。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识别代表考古学研究者对共性特征的判断,从学术史上看,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一个考古学文化可能会进一步分成若干个考古学文化。

除此之外,考古材料其他方面的意义并不是直接体现的,而需要进一步去分析,如放射性碳测年绝对年代的确定,需要依赖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从常规的方法到AMS(加速器质谱法);再比如古DNA分析对特定人群探源,其基于的是DNA变化的生物钟。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科学分析基本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它们都存在理论前提,通常这些前提都具有较好的古今一致性,即便存在一定的差异,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校正,如放射性碳测年的树轮校正。当代考古学在考古材料意义获取上高度依赖自然科学与考古学交叉形成的分析方法,并由此形成众多新兴学科分支领域。但是,基于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获取的考古材料的意义往往是单线条的,甚至是片面的,尽管结论明确,对考古材料有关人类过去活动的揭示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近年来,采用传统方法研究考古材料的考古学研究者不仅广泛参考多学科分析的结果,而且开始利用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来处理考古材料,如统计分析、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等,尽可能去揭示考古材料所能呈现出来的信息。当然,无论有多少材料,无论发掘精度有多高,考古材料本身仍然不会自己讲话。过程考古学的主要开创者宾福德以自己研究的挫折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他对法国康贝·格林纳尔遗址的石器材料进行研究,该遗址发掘精度高,地层序列完整,但是经过大量测量统计所得的信息仍然都是考古材料层面上的,而没有揭示出材料与古人生活的关系^[19]。宾福德意识到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论的缺乏,他不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材料,他需要建立起行为模式与材料形态之间的理论联系,而这个目标不是直接通过研究考古材料就能够建立起来的。

自下而上的归纳研究通常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对考古材料特征的提炼,识别其形态;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概念,此时往往需要借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如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古国理论中的“国(国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考古学的归纳研究不同于我们日常理解的归纳(如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的,一百只也都是白的,由此归纳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在归纳过程中仍然需要运用到理论,因为归纳研究的结论已经上升到人的层面上,而不再停留在物的层面上。至于说为什么可以从物(考古材料)的层面上升到人(古代社会与古人活动)的层面上,考古学的归纳研究通常是没有说明的,好像其中有约定俗成的理论指导。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理论,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考古研究者的常识或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的观察。这种基于未曾言明理论的归纳最终给人的印象就是“想当然”。文化历史考古学常依赖这样的归纳推理,因此,过程考古学兴起的时候,强调要明晰推理的理论前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考古材料出发的归纳推理同样需要面对跨越理论与材料之间鸿沟的难题,考古材料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由物及人。跨越的桥梁较为可靠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理论,以及基于具有时空关系的形态特征的提升,如从特征组合体到考古学文化再到假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形态。

3.2.3 中程理论

考古学中发展中程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跨越理论与材料之间的鸿沟,但是这个目标过于庞大,它几乎就等于考古学研究本身,实际上,它是构筑主要桥梁之前的辅助桥梁,提供考古推理的参考,既非自上而下的演绎推理,也非自下而上的归纳推理,而是平行的类比推理。它不是从理论出发的,也不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而是从类似古代的当代材料出发的。一般说来,中程理论研究可以包括民族考古、实验考古、某些历史考古(尤其是直接历史法)以及部分当代物质材料研究。

考古学在利用碎片信息拼合人类过去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模板或框架。中程理论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模拟、参考的框架。在过程考古强调发展中程理论之前,考古学研究中也用到与民族志的类比,当研究者发现考古材料与民族志的观察类似的时候,研究

者可能由此得到启发,认为考古材料所代表的人类行为可能与民族志的观察相同或相似。无疑其中很可能存在古今不一致的问题。中程理论的倡导者不满足于这种民族志的类比,而是希望从中获取有关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关系的普遍原理,超越中程理论作为类比研究的层次,进入演绎的层次。当宾福德20世纪60年代末到阿拉斯加的努那缪提(Nunamiut)人中开始他的“行动主义”研究(actualistic studies)的时候^[20],努那缪提人已经用上了雪地摩托车、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宾福德所研究的是冰缘环境中的猎人时间与空间上的流动性,并形成相应的遗址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只要是猎人而非动物驯养者,就必须利用自己的时间在一定的空间中寻找猎物;只要是猎人,他们围坐在火塘边(古人与现代人在身体的生理结构上基本相同),所能接受到的热量、所能听见的交谈,在空间距离上与现在并无两样。由此,就可以从努那缪提人的民族考古研究中提炼出狩猎采集在宏观与微观空间使用的基本模型^[19]。这样的模型不论是对于古代还是晚近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都是适用的。为了发挥民族志材料的作用,宾福德还曾对近400个狩猎采集者群体的文化生态条件进行研究,构建出农业起源之时不同的适应模型^[21]。

对于缺乏民族志材料的地方,还可以运用实验考古、历史考古与当代物质材料研究的手段。比如研究当代村落的废弃,不是说古人如同我们现在一样废弃,而是要探讨废弃过程中存在的一般规律,如废弃的速度、计划与否的影响等。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就像垃圾考古所做的^[22]。垃圾许多时候能够弥补口头资料、文献记录所存在的不足。在考古解释过程中,善用中程理论将有助于研究者获得必要的启示(解释的方向)以及获得部分原理上的支持。从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学研究实践来看,中程理论还无法完全排除古今不一致的问题;如果古今一致性非常高,往往又过于空泛,对于材料的具体解释帮助不大。总体上,它至少可以作为类比逻辑的研究,目标是要超越这个层次,形成具有普遍性的原理。

4 发展中国考古学的解释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观点是,考古解释的基础就是考古材料,考古学研究要让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考古学研究者面对的不是一个空白的世界,我们想了解什么,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以及考古材料本身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其中包含研究者与导致考古材料形成的主体的观念(理论)。考古解释居于理论与考古材料之间。考古解释可以从理论、材料或是跨越两者的途径出发,考古材料并不是唯一合理的研究出发点。将考古材料当作唯一出发点会限制考古解释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排除理论,实际上也就排除了考古解释的可能性。

按照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常规流程,田野调查与发掘有标准的程序,获得材料之后需要按照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进行整理,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细化与调整区

域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近些年来，研究中还增加了较多自然科学的分析，以获得更多有关考古材料性质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分析都是围绕考古材料本身展开的，涉及古人行为与社会的信息并不多，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古人行为或社会模式的认识。这里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推理上的跳跃，即从考古材料直接跨入古代社会，就好像从发烧、呕吐等病征直接得出病人罹患新冠肺炎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生理与病理环节，因此，即便判断正确，仍然是高度经验性的。以文明探源研究为例，通过考古材料的发现与整理，我们现在知道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诸如墓葬等级分化、城址、玉石钺等可能与文明化进程相关的特征，并且在已有的发现基础上，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但是我们没有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特征。没有理论原理的支持，既有的判断在逻辑上就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农业起源的研究中，驯化的动植物、磨制石器、陶器、墓葬等都是外在的特征，为什么有的狩猎采集者会走向农业起源，有的没有？用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原理能够较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能够较好地解释考古材料的构成。

要发展中国考古学的解释，关键无疑就在于理论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解释。而要促进理论建设，首先要解决理论来源的问题。上面提到运用自然科学手段分析考古材料，其中就利用到了相关的理论，如古DNA分析，之所以能够通过提取古DNA的手段来了解古代人群的迁徙与混血，其立足点就是生物遗传学理论。目前中国考古学在运用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上进展迅速，由此形成了不少学科交叉领域。相比而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较少，从当代西方考古学的发展来看，与考古解释相关的理论来源广泛。还是以文明探源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有参与，帮助我们理解权力的发生机制、表现形式与演化阶段。受制于中国社会与人文科学自身的发展，目前还不能为考古学提供多样的理论。考古学研究者自身也相对忽视从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去获取理论。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但最终目的还是要研究人及其社会，因此学科性质必定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因此，要想加强理论建设，必须同时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

考古解释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是中程理论，中程理论是直接以发展考古解释为目的所构建的，不论是民族考古、实验考古、历史考古，还是当代物质遗存的研究，最终成果应该是能够构建出理论模型，而不应该是一堆调查材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领域曾展开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材料。随着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这批材料尽管不完整，但仍然可以用作发展中程理论的基础。就发展理论模型而言，还可以利用西方学术界收集的民族志材料。材料基础越广泛，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就越高。实验考古研究同样如此，石器研究十分需要实验工作，当前的实验工作还是较为初步，缺少系统性，如果能够开展系统性的石器实验，并借鉴世界范围的成果，那么就有可能针对中国的石器技术发展提炼合用的理论模型，帮助解释考古材料。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实践表明，以流动性、预备性等概念所建立的

理论模型,对于发挥石器材料解释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上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23]。

考古材料本身是否可以成为理论来源呢?从一般意义上说,当然是可以的,许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有限的事实发展起来的,然后用于解释更大范围的现象。但是,迄今为止,在考古学领域的成功实践还比较少见。究其原因,还是考古材料本身与古人行为或古代社会有比较大的距离,即便提出了理论模型,也无法检验。古国理论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其基础是考古学文化,具有“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样一个发展序列^[24]。古国理论是归纳提炼所得。它并没有如理论那样描述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机制与动因,因此,有研究认为古国理论并不是探讨文明起源的科学理论^[25]。实际上,古国理论暗含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起源的原理,只是对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者而言,这是无须赘述的事实。现在中国考古学者用古国指代距今6000至距今4000年之间的复杂社会,在实践上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同时,它作为中国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学术话语,代表一种主位的、历史导向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中,考古解释通常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与文化背景很清楚,文献资料丰富,物质文化传统连续。作为中国人,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样的背景关联,自然也就不难知道考古材料所代表的意义,这正是直接历史法的魅力所在。清晰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关联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理论模型的作用,当然,它还不能替代理论模型在认识长时段事件上的意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考古解释是一个过程,它可以分为若干个环节或层面来展开,可以分为三个或五个^[9,26],它们就像若干段桥梁一样把理论与材料连通起来,由此,在不同的环节需要不同的理论模型,并不存在一个全覆盖的理论模型。发展考古解释,还需要考虑理论层次的问题。如果中国考古学注意考古解释的理论建设,那么就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研究将可以走出局限于考古材料特征研究的内卷状态,发展更可靠的有关过去社会的推理,得到更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汉森.发现的模式[M].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 [2] 陈胜前.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J].东南文化,2013(5).
- [3] BINFORD L R.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J]. American Antiquity, 1980, 45(1): 4-20.
- [4] PATRIK L E. Is there an archaeological record? [G]//SCHIFFER M B.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ume 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27-62.
- [5] HODDER I.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M]// SCHIFFER M B.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ume 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1-26.
- [6] 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7] CHILDE V G.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透物见人”问题[J].考古,2014(10).

- [10] BOSERUP E.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M].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5.
- [11] COHEN M 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overpop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2] HAYDEN B. Practical and prestige techn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systems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8, 5(1): 1-55.
- [13] 塞维斯.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文化演进的过程 [M]. 龚辛, 郭璐莎, 陈力子,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14] BARKER A W. Chieftdoms [G]// BENTLEY R A, MASCHNER H D G, CHIPPINDALE C.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8: 515-532.
- [15]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 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M]. 徐式谷, 奚瑞森, 邹如山,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16] CARNEIRO R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J]. *Science*, 1970, 169(3947): 733-738.
- [17] 柴尔德. 人类创造了自身 [M]. 安家瑗, 余敬东,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18] DUNBAR R I M. The human story: a new history of mankind's evolution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4.
- [19] 宾福德. 追寻人类的过去: 解释考古材料 [M]. 陈胜前,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20] BINFORD L R.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 [21] BINFORD L R.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22] RATHJE W L, MURPHY C. *Rubbish!: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 [M]. Tucs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1.
- [23] 陈胜前. 考古学“透物见人”的概念构建——以旧石器考古为例 [M]//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考古学研究: 十三.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 [24] 苏秉琦.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 [J]. *文物*, 1986(8).
- [25] 易建平. 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1).
- [26] 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 [M]. 陈淳, 译. 2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How is an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possible?

CHEN Shengqian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is the inferring process from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o information of past societies. However,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annot talk by themselves.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reason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ies and material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is not really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s we generally assumed. After analyzing formation processe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l starting point is theory. Theory building therefore is the key to develop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point related to the current problem of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sources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should also include the theories from social and humanity sciences, and the middle-range theories that predominantly work for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s, except the related theories from physical sciences.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archaeological theory; scientific inferenc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ory building